



面 子

Face

一看到‘面子’这个词,就会感到再没有比这更悖理的了,居然这样称呼作为全人类一部分的中国人的一种‘特性’。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简单地指人的脸,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比我们所能描述或者可能领悟的含义还要多。

哪怕是部分地理解‘面子’的意思,我们也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戏剧几乎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娱乐,中国人喜好戏剧,就像英国人喜好体育、西班牙人喜好斗牛一样。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任何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作戏里的一个角色。他像做戏一样装模作样,行磕头礼,屈下双膝,趴下身子,往地下叩头,对于这种情形,西方人即便不视为荒唐可笑,也认为是画蛇添足。中国人是按照戏剧方式思维的。一旦为了唤起自己的尊严,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面对一大群人,他喊叫道:“我说,这里有你,有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烦恼排解了,他会说自己在荣誉和称许声中下了舞台。如果烦恼没有排解,他就无法下台。所有这些,只要看懂了,就要发现它们与实际没有任何联系。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

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我们并不进入幕后，因为那样将破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戏。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做出类似的戏剧行动就叫有“面子”。使他们失望，不理睬他们，打断他们的戏，就是使他们失掉“面子”。一旦正确领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面子”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钥匙。

附带说一下，调节“面子”的原则和从中获得的学问，常常完全超出西方人的知识和理解力之外。西方人总是忘记中国人办事中的戏剧因素，误入无关的事实领域。对于西方人来说，仿佛时常觉得中国人的“面子”，像南洋的戒律那样，是一种不容否认的潜在力量，不同的是面子反复无常，不受法律约束，它仅仅按照世故常情废除和更换。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洋人必须承认差异，他们从来不能在同样情况下对同一事物得出一致的观点。在调解村庄纷扰、无休无止的争吵时，“和事佬”需要仔细考虑如何保全双方的“面子”，就像欧洲政治家曾经考虑的力量均衡一样。在这样的状况下，目的不在于实行公正，尽管从道理上讲，也抱有这种希望，但是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几乎是几乎不可能实施的。这样的调停完全是平衡有关各方的面子。在诉讼的裁决中，也常实行这样的原则，所以其结局在很大成分上可以说是一场拉锯游戏。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是“给他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送的，受礼人应该仅仅接受一部分，很少或者说从来也没有全部接受，或一律拒收。一些人渴望保住“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缺点被人指出来，是“失掉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明显，也必须矢口否认，一意要挽回面子。网球丢了，不仅仅是怀疑，而是有证据足以判明是一个苦力捡到了，他就会愤怒地否认，然后走到丢球的地方，这时很快发现球在地上（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故作姿态地说：“这是你‘丢失’的球。”侍女把客人的铅笔刀藏在他主人的房子里，以后在桌布下面发现了，就会装作得意洋洋的样子拿出来给人看。在这种情况下，“面子”是保住了。一个仆人不小丢失了一件物品，他知道他必须赔偿，或者从他的工钱里扣除相当的数目，于是他提出辞职，并清高地说：“那钱抵赔那银匙子吧，我不要了。”

这样，他的面子没有损伤。一个人明明知道一笔属于他的债款无法收回来，也要到欠债人那里去，严厉的恐吓一番，以此表明他胸中有数。他没要到钱，但保住了他的“面子”，这样才能保证他将来放债时不再讨不回钱。一个仆人失职，或者拒绝履行一些职责，当他确知主人要辞退他时，就会重复以前的过失，辞职，保住他的‘面子’。

对我们来说，保住面子，然后送了性命，似乎是很不值得的，但是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作为一种特殊的恩惠，被杀头的时候准许穿着官服，以保住他的‘面子’！



节 俭

Economy

“节俭”这个词,意味着治家原则,特别是收支关系。按照我们的理解,节俭表现在以下三个不同的方面 限制需求,杜绝浪费,以这样的方式调节经济,少花钱,多办事。照这三方面衡量,中国人是异常节俭的。

到中国的旅行者最初的印象之一,是中国人的饮食极端俭朴。众多的人口似乎仅仅依赖种类很少的食品维生,诸如稻米、各类豆制品、谷子、蔬菜和鱼。这些食品,和其它一些很少的东西,构成亿万人的主要食物,只是过节或逢有特殊事情,才加一点儿肉。

现在,很多人注意到西方世界设法为穷人提供价廉物美的食品,但是也不能不关注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就是在平常年景,中国能够以每天不到两分钱的价格为每个成年人提供足够量的营养食品。甚至在饥荒年月,成千上万的人连续数月以一天价值不到一分半钱的定量分配维持生命。这表明中国的烹饪技术普遍达到了高水平。虽然对于外国人来说,似乎经常觉得中国人的食物是低劣、粗糙、乏味甚至倒胃口的,然而却不能不承认在饮食和服务方面,中国人是有经验的烹调师。在这一点上,温格洛夫·库克(Wingrove Cooke)先生把中国人排在法国人之下,英国人

(包括美国人)之上。中国人是否应排在任何一个国家之下,我们决不像库克先生那样确定,不过他们在一些国家之上却是无可争议的。如前所述,中国人的食物种类是这样简单,所以甚至从生理科学的观点来看,也显而易见,中国人对主要食品的选择是很高明的。他们烹调技术精湛,构料简单,却能不断地花样翻新,品种繁多,这一点,极少注意中国烹饪术的人也是全然了解的。

另外一件事实,极有意义,却不引人注意,但是很易证实。这就是中国人做饭很少浪费,所有的东西都要物尽其用。普通的中国家庭,饭后都要把剩饭留下,尽管这些剩饭很不值钱。只要看一看中国狗、猫的生活条件,就足以证明这个普遍事实了。这些动物靠人们的剩饭,艰难“生存”,始终挣扎在“死亡线上”。新兴国家人们的浪费,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毫不置疑,像美国这样很容易生活的国家,每天浪费的物品,足以支持六千万亚洲人过比较富裕的生活。我们愿意看到这样多的人被剩余产品养肥,就像许多中国人“吃饱”之后,仆人或孩子把他们的残羹剩饭打扫干净。甚至于茶杯里剩茶也要倒回茶壶里,重新热过再喝。

还有一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这就是人类对入口食物是极端讲究卫生的,欧洲人是愈来愈注意这一点了,中国人却不以为然。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网中之鱼,迟早都要吃掉。中国北方,普遍驱使马、骡子、牛和驴,部分地区驱使骆驼。无疑,我们述及这样的惯例时,一些读者会感到这样做真是过于节俭了——牲畜死亡之后,无论是死于事故,还是老死、病死,统统都要吃掉。这种习惯,不管是偶然的,还是经常的,自然都应该纠正,因为牲畜可能死于胸膜肺炎之类的流行病。这类病畜肉,吃了会生病的,这一点,人们廉价购买时是知道的,但是肉还是全部卖出去,被人吃光了。明知有害,还是要买,无疑是为了图便宜,不过应该说,中国人冒险吃了病畜肉,并非一定生病。死狗和死猫,也像死的马、骡、驴一样被吃掉。我们曾经亲身了解几起村民烹吃死狗的实例,这些狗是为了排除骚扰,有意下剧毒药毒死的。一次,一位外国医生考虑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前往劝阻,但是狗“已经下锅”了,吃这种狗肉可能造成的生命危险,并不能促使他们决心放弃这顿美餐,还是饕餮而尽,可是放纵

乱吃之后，竟然没有生病。

另一个说明中国人节俭的例子，也与做饭有关，这就是为了解决燃料的紧缺，精心挑选制作炊锅的材料。在中国，燃料是匮乏和珍贵的，而且总是树叶、庄稼的根茎、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这些都是一燃即逝，容易烧完的。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锅底要尽可能做薄，需要很小心地操作。拾柴禾的整个过程，是一个附带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人节俭到了极点。最小的孩子，不能干其它活儿，至少都能够拾柴禾。秋天和冬天的大地上，遍布拾柴的广大人群。经过他们的竹耙利齿如饥似渴地搂扒，地上连一根草屑都不剩了。孩子们被派到树林里，用木棍打秋叶，好像这些秋叶是栗子，甚至草莓，一些心切的拾柴人还没来及‘争抢’，秋风吹过的路上就很少有秋叶散落了。

所有的中国家庭主妇都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使用她的布料。她的衣裙不像欧洲姐妹那样，在花样和款式上奢侈豪华，而是全力设法节省时间、精力和材料。最小的一片外国布料，到了中国妇女手里也会受到欢迎，她们不图美观，而是重新发挥其效用，物尽其用的程度是‘家政’议会的全体女作家未曾梦想到的。一处不能用的，保险用在另一处，一些碎布条也要充分利用，用来纳鞋底。伦敦或纽约的慈善者，把不用的衣物施舍予人，而又怀着一种荒唐的希望，希望被救济的穷人将东西搁置不用，这样做弊多利少。但是，无论是谁，如果把同样的东西施舍给中国人，尽管他们使用的布料和穿着款式与我们迥然不同，也有充分根据确信，这些物品始终会尽其所用，最后的下脚料也要和其它布料搭配使用，直到用尽为止。

中国人时常给朋友题字表示祝贺，题字的纸稀松地缝在一块绢帛上。之所以松缝，而不粘贴，是为了使受赠者有一块长期使用的绢帛，如果另有选择，可以把旧字移下来，换上新字。

中国人的节俭，在小零售商的交易中也有所反映，对他们来说，多小的东西也会引起注意。譬如，一个小零售商能够告诉你不同种类火柴每盒中的精确根数，他了解每盒火柴的微小赢利。

中国人的帐簿用过以后，就用来糊窗户，包纸灯笼，每一页都派以用

场。

中国人为了坚持节俭，甚至不惜压缩日常必需的食品。他们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悖理之处，而是处之泰然。B.C. 亨利(Henry)博士在《十字架与龙》(*The Cross and the Dragon*)一书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五个小时，行程二十三英里，然后又走回广州，去吃为他们提供的早饭。吃早饭之前走了四十六英里，其中一半路程是负重的，而这仅仅是为了节省五分钱。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两名轿夫抬轿走了三十五英里，虽然从早晨六点起就没有吃过东西，也要空着肚子撑船回去，舍不得花三分钱买两大碗米饭吃。船搁浅了，第二天下午二点还没有到达广州。到这时，这些人已经二十七小时没有吃饭了，负重走了三十五英里，其中抬着亨利博士去广州走了十五英里以上，不光抬人，还得加上他行李的分量啊！

对于西方人来说，并非对中国人因节俭所获得的许多成果全都不满意，但是对于由此构成的纯朴天性，却不能赞许。在帝国的部分地区，特别是(说也奇怪)在北方，一年中有好几个月，男女孩子都像在伊甸园里那样，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到处乱跑。这样做，对于他们来说，是为了舒服一些，然而首要的动机是为了节俭，为了省衣服。中国的独轮车大部分推起来吱扭吱扭嘎嘎作响，这是因为缺少润滑油的缘故，虽然上几滴油就可以使车子不响了，却从来没有上过，因为对于那些被称为‘神经麻木’的人们来说，以为嘈杂声比油更便宜，宁愿嘎嘎响，也不上几滴油。

如果一个日本人侨居国外，特别约定的条件就是每天为他提供多少加仑的热水，以便他按照习惯洗热水澡。中国人也有他们的浴室，但是大部分中国人从来没有接近过，甚至实际上压根没有见过。一位中国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满身尘土，就用一把旧笤帚给孩子扫土，一位好奇的外国妇人说道：“你的孩子每天都洗吗？”每天都洗？！中国妈妈惊怒地回答，“他生下来之后，还从来没洗过呢！”一般对于中国人来说，肥皂零售商即便把‘比土便宜’的箴言，贴到橱窗上，也不会有什么启悟。

就像意大利人看待英国人那样，中国人无疑把一般外国人都视为浪费肥皂的人。在中国洗衣服也需要用肥皂，然而中国人尽量节省，用量很

少,与我们所说的洁净度相比,他们几乎无所谓洁净可言。许多中国人和我们一样爱干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纵令有严重缺陷,却堪称整洁的模范,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他们之所以那样做,是为了节俭。

由于节俭的本性所致,一般不可能买到任何现成的工具。你可以买到一些“半成品”,然后自己加工,修整。因为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所有的人都图便宜,于是就没有现成货了。

用料之节俭,我们已经说过了,譬如盖普通房子,因为舍不得花钱,光线很暗,用隔墙分成的两个房间都很黑,就如置身于有隔墙的洞穴中。在中国的工厂里,诸如各类纺织厂,陶器、金属、象牙等等作坊,可以看到这种黑暗房屋的典型实例。对于我们来说,这类工业,似乎不像说明中国人的节俭那样,有许多例证表明他们的创造发明才智。本来能够创造许多更好的方法做中国人的工作,这些方法比他们所采取的先进,但是却没有进行创造,再没有比与中国人一起做事更无效益,更拖沓了。他们好像能够无所谓方式方法地制造所有的物品,这样,他们的产品,不论简单还是复杂,总是一个样子,没有特色。他们的炼铁炉,建在一个小院子里,空积很小,使用起来很像是一口可以施展高超烹调术的炒菜锅,原本一个小时就可从砖炉中炼成铁,却无限地延续,熟练地操作,不计算经济价值。

在完成这项任务当中,可以找到虽不是更多、然而却更富于特征的实例,说明中国人用具的简陋。在中国,每年有大量谷物作为贡品送往北京,这项工作有所管理,又完全缺乏管理。谷物从天津装船,顺北运河运往通州卸船。在“谷物交换”市场会吃惊地发现,堆积如山的稻粟本来需要用机械卸船、称量和搬运,然而却只用一队苦力承担一切工作,用具是一种做得像截锥、容量一“蒲式耳”的箱子(斗——译者),和数量不定的苇席。仅仅是这些,再没有其它。席子铺在地上,谷物注入席围,再次称量,装袋,运走,席子收起,帝国的谷物交换市场又变成光秃秃的泥岸。

在美国烟草种植园,最沉重的开支是为了烘干烟叶而建筑一个长长的结构精致的棚子。中国的烟草农场,却不肯为此花钱。棚子是茅草搭的。用过以后,陈草正好作燃料,跟新草一样好。烟叶打裹时,肥大、坚硬的根茎立起来,用草绳将根茎捆紧,夜里用绳子吊起来,好像挂在绳子上

的衣服,这个法子真是再简便、有效不过了。

所有居住在中国留心观察的人,都能补充一些例子,阐释中国的社会现实,但是或许没有比这样的实例更能反映中国人的节俭了:一位老妇人移动痛苦、缓慢的步履,沿墙蹒跚,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到亲戚家去,好死在离祖坟更近的地方,这样可以缩短距离,节省抬棺材的花费。

3

勤 劳

Industry

勤劳意味着对任何工作都习以为性的勤勉——始终倾注全力。在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值得盛赞的美德之一,永远受到尊重。

一个民族的勤劳,大致说来包括三个方面:长度、广度和强度。换句话说,两方面表示范围,一方面表示张力。长度,是劳作的时间量。广度,指勤劳者的人数。张力,指‘习以为性的勤勉’和在‘始终倾注全力’的工作中所发挥的能量。这三个因素综合在一起,形成最后的结论。当然,偶尔一游的旅行者和长期定居的侨民所获得的印象并不相同。然而无论是谁,无疑都深深感到了中国人的勤劳。初到中国的人,第一个印象就会是:这个民族在社会事务中正在履行约翰·韦斯理(John Wesley)所说的格言——“全部投入,始终投入”。这是一个成功教会的守则。在中国,懒惰是不常见的。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做着什么。当然,纵令富人在全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也有一定数量。他们可以不做工作,也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外国人表面看到的那样平庸。在中国,富人并不放弃工作,他们仍像贫穷时那样,对自己的事业投注同样的热情。

中国人自己分为学者、农民、工匠和商人。让我们分别看一看这些社

会阶层，看他们是如何体现本民族勤劳美德的吧。

西方人很难同情中国的教育模式，其中许多弊病都不容忽视，而有一点却总引起人们的注意——是为了勤奋而勤奋，除了勤奋之外，什么报酬也没有。为有钱人购买学位而敞开的店门，势必挫伤了所有学生的热情，但这并不是出售官职所造成的主要后果，人们仍然热中科举。各省都在抱怨，候补的人远远多于空缺。全部考场，从最低到最高的，都挤满了考生。竞争一个职位的考生常常超过一万人。试想一下每次考试中考生们所付出的心血，就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勤奋留下鲜明印象了。《三字经》记述了苦学者的勤奋事迹：借萤火虫的微光读书，把书拴在耕牛角上阅读。至今仍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进学者奉为楷模。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入学就不再勤勉了，但是中国人并不把这类人当作学者，只有那些在狭窄而充满荆棘的路上奋斗不止、直至学业有成的人，才能获得学者的荣耀。除了中国，我们又能在什么地方看到爷爷、儿子、孙子共赴同一考场，经过多年不屈不挠的努力，直到八十岁才赢得长久渴慕的荣誉？

1889年春天，北京《邸报》刊登了几份有关省试中年老考生情况的奏折。福建总督报告说，该省秋试中有九位考生年过八十，两位年过九十，通过了规定的考试，呈上的文章，结构严谨，书法挺秀。他说，这些老考生在进学之后的六十年间，已经参加了三次晋级考试，如果第四次不成功，就会授予名誉学位。河南总督同样报告说，考生中有十三位超过八十岁，一位年逾九十，全部“通过了整整九天的严酷考试，文章完美，用词准确，没有暮年的痕迹”。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省的报告，那里的考生三十五位八十开外，十三位九十以上！你能在其它国家看到这样的景观吗？

倘若中国学者的生活勤奋不辍的话，农民就更不逊色了。他们的工作，有如管家一样，没有做完的时候，北方各省，除了一段冬闲之外，其它时间都有大量的活儿要干。无疑，所有国家的农民都多少勤于劳作，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却是其他民族无法相比的。

农民阶级尚且如此，没有土地、单靠劳力为生的农工，就更是极度勤苦了。他们长年累月挣扎在饥饿线上，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当农民竭尽心虑照管每一棵白菜、仔细清除幼小的害虫、又以更大的耐心抓毛

虫的时候，农工就要留心更为琐屑的工作，因为他须挣点儿吃食养家糊口。那些出门的人，也常常半夜起身赶路，因为大家都是这个习惯。但是，不管你几时上路，都可以看到手里拿叉、肩上背筐的农民、在路上拾粪。没有其它事情可做时，这是一份永不完结的工作。

还常看到一些人寻找两种工作相互调济。天津的船夫，在河流封冻不能行船时，就拉冰橇，搞快运，赚微薄的收入。同样，一些地区农村中的大多数人，农闲时制帽编带，现在还有大量产品出口。中国妇女手里总是在纳鞋底，就是在街口聊天时也不闲着，不然就纺棉花，从来不偷懒。

商人及其雇员，称得上是不知疲倦的阶级。即使在西方，店员生活也不轻松，但是与中国店员相比，却清闲多了。中国店员的工作，永远没有头。虽然在生意清淡时可以插入一些休息日，他们也几乎没有假日，任务总是繁重。

中国店铺开张早，打烊迟，帐簿制度很烦琐，使得帐房为了算清收支而时常忙到很晚。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店员们就坐下来挑捡铜钱，以便找出罕见的，卖个好价钱。

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工作最勤勉的阶层，竟是最让人嫉妒、每一个有野心的中国人都设法跻身的——政界。各级中国官吏都必须独自处理公务，其数量之巨，种类之繁，同样令人惊讶，因为公务处理得成功与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由他一人负责。我们为八小时工作制奋斗的工会会员们，看到如下一张日程表会作何感想呢？这张表来自北京外国使团一位翻译关于一位中国显赫政治家的情况报告：“我曾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他一直在抱怨日常工作的繁重和疲惫。他回答说，他每天凌晨两点从家里出发，三点至六点在宫内值班。作为内阁大臣，六点至九点全部在朝中议事。九点至十一点，作为兵部大臣，在兵部办公。作为刑部成员，十二点至下午两点，在刑部例行公务。每天下午，又要作为资深部长，在外务部工作到五六点钟。这是他的日常公务，除此之外，他还经常被指派参与特殊会议，这只能临时插空进行。这样，他几乎很少在晚上七八点钟之前到家。”这次谈话六个月之后，这位大臣去世了。不奇怪，他是由于工作过量、心力交瘁去世的。同样的原因，使中国许多官员过早结

束了职业生涯。而他们若能继续工作，是有益于政府的。

我们已经说过，范围指勤劳者的人数和劳作的时间量。可以看出，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是巨大的。中国的一天，开始于天色朦胧中，而不是大亮时。中国皇帝上早朝时，欧洲的宫廷还沉睡在梦乡中。这对西方人来说，似乎不可思议，中国人却认为是很自然的事。上行下效，各地的臣民不同程度地模仿天子的行为。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铂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纺棉的和磨面的工人，都是起五更，睡半夜。天亮之前，旅行者就可以看到村民们已经来到离家数里的集镇，站立在黑暗中等待天明。天一亮，他们就将开始卖白菜。西方人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近结束了。再没有比夏季清晨五点半时光，漫步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更能使你感受到东西方的强烈反差了：那些在黄浦江畔建起了高楼大厦、在里面经营商业的西方人，街头不见踪影，而亚洲人已经熙熙攘攘、全力经营很长时间了。几小时之后，西方人才开始在人行道上，与中国人摩肩接踵，轻轻松松地开始他们一天的工作。而这时，当地人已经干完半天的活儿了。

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先生评论中国人的‘愉快劳动’时说过 这标志着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满足于自己的环境。这种劳动的品质，是中国人最突出的特性,理应长久保持下去,并得到高度的重视。

我们还要对中国人勤劳的强度说上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他们干活也像亚洲人，试图按照我们的模式改造这个富有活力的民族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当然缺乏我们高度推崇的诚心。英国人不用上帝的暗示，就能意识到诚心竭力做事的重要性。而中国人尽管综合了当代宗教与哲学的思想，却不能改变他们前进的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像荷马神那样,从来不匆匆忙忙。

人们不禁预想，白种人和黄种人将进入空前激烈的竞争。那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谁将进退维谷、走投无路呢？

诚然,如果所罗门(Solomon) 的经济格言是正确的：勤劳的双手可以致富。中国就应该成为地球上最兴盛的民族之一了。无疑。倘若他们能在自己的美德中找一种平衡，弥补明显缺乏的一些基本品质，例如“忠诚的

美德”，一言以蔽之，就是他们所缺乏的‘诚’。无论通过什么方法，只要诚和爱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恢复其应有的理论地位，那么（不久的将来），中国人将会获得他们无与伦比的勤劳所带来的全部报偿。



礼 节

Politeness

一般说来，中国人和东方人的礼节，有两个不同的方面需要人们注意——一个是赞赏，另一个是批评。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常常喜欢称赞自己的许多好的品德，而其中行动果断的成分多，态度温和的成分少。因此，当我们来到东方的时候，发现亚洲大陆上的众多人口在调解人际摩擦的技巧方面远远胜于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敬意。对于这样一个彬彬有礼而又做得如此自然轻松的民族，我们实在不能妄加评论。即使最挑剔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节升华到了一个完美的境界。这不仅是西方人所未知的，而且是亲临其境前想不到，甚至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中国经典上记载着礼仪准则三百条，行为准则三千条。在如此繁多礼节的重压之下，我们似乎无法想象一个民族还能繁衍下去。但我们很快发现，中国人就像对待他们的教育那样，使礼节成为一种非后天习得的本能。这个民族的圣贤，使繁文缛节成为人们日常交往中的一部分，而在西方则连宫廷和外交事务中都已废弃了。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被这些繁文缛节束缚住了，而是说这些礼节就像节日的盛装，到了一

定时节，就会穿戴起来，中国人凭着准确无误的本能，就会意识到这种时节的到来。在这样的时节，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会像西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知道九乘九是多少一样，令人感到荒谬可笑。

西方人之所以难于赞赏中国人的礼节，在于我们心目中有这样的定义：“礼节是诚挚地表示诚意。”在文明国家看来，从理论上讲，个人的幸福就是全体的幸福，须从这点出发认识礼节。然而，在中国，礼节却不是这种性质的。像所有的技艺一样，礼节的演示程序和专门用语的重要意义，并不发自内心，而是复杂整体中的个体部分。尊称的整个理论与使用，即使不令西方人发疯，也令其不知所措。很清楚，这些用语是旨在保持固定的尊卑关系，这在中国人看来，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调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上有其下，下有其上，上下有序，各就其位，一切都好了。就像下棋那样，先走者宣布：“敝王贱卒走两步。”同伴回答：“敝王贱卒也走两步。”对手又告知：“敝王卑贱的士，吃掉尊王高贵的卒，到达敝王辖区可怜的第三格。”如此贯穿整个棋局。棋局并不受这种尊称和形容词的影响，正如下棋者不能说出下一步棋那样，一个人试做不明了的事，就会使自己显得荒谬可笑。然而，中国人却理应不感到礼貌地说出下一步棋会成为笑柄，因为在中国人的情境中，形容词就是棋局，不知道这些形容词就等于什么都不知道。

同时，中国人对礼节的恪守，会随着远离中心城市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一个人回到农村的时候，虽然他同样认为有必要遵守礼节，然而却并不意味着他仍然熟悉从城市学得的礼节细则。

但是，必须同时承认，迟管中国也有很少的人不知道什么场合行什么礼，最有教养的外国人也不能相比。与他们相比，外国人完全是怀中的婴儿。一般说来，除非这个外国人以前有这方面的经验，心里又唯恐自己有失礼之处，暴露自己没有知识和教养。正是西方人在适应中国礼节方面显露的无能，使得中国知识阶层用这般毫不掩饰（不是不自然的）的蔑视眼光看待这些“野蛮人”；他们不知“方圆”，甚至熟悉了礼节生活的用语与优雅之时，也表现得麻木不仁与无法克服的无知。

礼节如同一个气垫，里面什么都没有，却减轻了颠簸的痛苦。同时，

公正地说，中国人向外国人表示礼貌，与跟自己的同胞演示一样，更经常的是为了表现自己懂得礼节，并非想使客人惬意。他执意生起你不想让生的火，沏一杯你不想喝的茶，熏得你满眼是烟，呛得你喉咙里像塞进难咽的苦药；但是主人至少树立了一种印象：他知道怎样礼遇客人。倘若客人不愉快，那只是客人不好。同样，在乡下，主人认为他有责任把借你寄宿的陋室打扫一下，象征性地布置一番，你已经来到房间了，他仍然继续打扫，飞扬的尘土迷了你的眼睛，你恳求他不要做了，他却还不停止。或许，这是《礼记》上的教诲，待客的房间必须打扫，无论旅行者如何厌烦都继续打扫。宴请也是如此，那简直是一种未曾经历的恐怖，一种过度施予而非罕见的恐怖，热情的主人特地在你的盘子堆满了食物，他自以为你喜欢吃，其实你一点儿也不想吃，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似乎会说，那是你的不对。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这方面没有失礼，不会有任何人责备他没有在适当地时刻行适当的礼。倘若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那是他自己的事，与主人无关。

按照这种原则，一位中国新娘尽责拜会一位外国夫人时，有意背朝这位夫人，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礼，使女主人困惑和恼怒。过后质问，才知道新娘朝北伏拜，是因为皇上住在北边，并不在意她要敬谒的女主人正在房子的南边。如果这位外国夫人不明白自己应该站在房子的哪一边，新娘也就不必考虑她的方位；至少，她可以表明自己知道该朝哪个方向磕头。

中国的礼节时常体现在礼物的形式上。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是给受礼者“面子”。赠品有固定的式样。一个常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总会收到一些点心盒，用干净的红纸包着，里面放着油腻的糕点，他根本不会吃的，但是送礼者绝不收回，即使受礼者一再表示（被逼得无路可走）他不得不把这些点心全部送给别的中国人，也无济于事。

中国的礼节并不意味着禁止人们“对礼物吹毛求疵”。经常会有人询问礼物的价钱，客人跟男、女主人告别时常说：“给您添麻烦了，让您破费了！”

一位外国人曾被邀请参加一次婚礼。婚礼上有丰盛的糕点，宴席进